

新中国货币统一初探(1949-1953)^(*)

○ 王春英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新中国货币统一的过程实际也是中央建立国家信用体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民币的推广与占领市场成为关键,换言之,民众对人民币的接受与否成为国家政策的焦点。为此,中央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促使民众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货币统一的过程中。这一系列政策及其背后的逻辑对195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财经统一;货币统一;人民币下乡;统购统销

建国前后的财经统一是建立统一新中国的重要一环,不仅促成了现代中国财经政策雏形的出现,而且对新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财经统一的内容包括税收、公粮、货币等的统一,统一的本质是中央的统一调度。这两方面构成了国家统一财经的完整过程。据此,中央将全国的军政机关、学校、国营企业的人员、物资,通过全国编制委员会及国家银行等纳入到国家经济的管理中,这实际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¹⁾在这一过程中,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交换媒介,是沟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的重要中介。

统一的货币市场是如何出现的?区域性的货币统一过程首先被学者纳入研究视野中。魏宏运对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边币的发行及统一市场的过程进行了探讨。⁽²⁾这为我们理解建国前后人民币的统一提供了借鉴。石雷作为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的参与者之一,详细地回忆了人民币的出现及货币统一的过程,丰富了我们对此问题的感性认识。⁽³⁾在此基础上,武力梳理了建国前后货币统一的

作者简介:王春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系讲师。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批准号:10YJC770085)系列成果之一。本文写作源于上海交通大学“50年代档案研读班”的一次讨论。写作过程中得到曹树基教授的指导,在此致以谢忱。

手段及过程,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制度变革”。⁽⁴⁾

现有研究初步勾勒出了货币统一的一般过程,但在诸多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如人民币统一过程中中央政策与其具体实践层面之间是否一致?民众对币制变化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厘清这些问题是深入探讨币制改革如何影响之后经济政策的关键。否则,我们难以对货币统一对新中国经济体系确立的意义做出准确评估。

鉴于此,本文将侧重解决以下问题:(1)在财经统一的大背景下,细究货币统一如何进行?(2)新的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3)货币统一政策对1950年代整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如何?笔者希望通过这几个问题的研究,能推进学界对建国初期我国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认识,理清新中国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货币信用体系的。

一、全国性统一货币的推出

1. 解放区货币的初步统一

1947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中共控制的区域范围虽不断扩大,但战争支出亦日益增加,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多陷入困境。为了支持战争,必须对财经资源统一调配。中共中央决定由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筹备一次统一领导财经的会议,此即后来的华北财经会议。⁽⁵⁾当时各解放区内部的财经统一尚未实现,因此,会议议定以边区为单位,实现边区内部财经的大部分统一。要实现这样的设想,须有稳固的货币体系。为此,会议要求各区应尽量掌握重要物资如粮食、布、棉等,以能独立平衡物价,摆脱法币的影响,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同时,要注意货币回笼,避免货币滥发,以便控制解放区内每人平均货币流通量,达到收支平衡。⁽⁶⁾

这次会议明确了边区内部财经统一工作的方向,由统一财经所延伸出来处理货币问题的大政方针,也成为后来中共在解决物价与货币问题时的常规手段。

之后为了将华北财政统一于中央,1947年8月,华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华北财办)成立,董必武为主任。办事处虽然在消除边区间的关税壁垒及促使边区货币间的相互扶持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当时中共控制下的华北、华东、西北、东北等解放区仍然存在不同的财政货币体系。各解放区间的物资交换和货币流转十分不便。为解决这一问题,1948年,华北财办联合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东北等各解放区的财经代表召开了华北金融贸易会议,讨论货币统一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会议最后决定在相邻地区,如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山东和西北等,尝试先以联合办事处的形式来统一货币比价,俟条件成熟实现华北货币统一。⁽⁷⁾

7月初,中央在华北财办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中财部),以便联合调度,统一华北、西北、华东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当然,要达成统一货币的目的,须与贸易统一、财经统一齐头并进,因此,10月,中财部直属下的华北财经

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统一三区财经的工作。当时中共控制下的华北、山东、晋绥、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分别为冀钞、北币、农币、边币。中央决定从10月5日开始冀钞与北币以1:1、边币与北币以10:1、冀钞与农币以1:20的固定比价开始流通,解放区之间实行了货币的初步统一。⁽⁸⁾

2.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联合指挥部门的相继出现,一方面说明了财经统一工作的必要性和紧急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财经统一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态度有差异。对某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来说,中央的平衡政策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因此,中央的统一政策虽然为各区所认同,但具体执行却困难重重。这一时期,协调地区间的差距成为中财办的工作重点。⁽⁹⁾

以华北与华东区货币统一为例。在货币统一之前,1948年9月,北币与冀钞之间的实际比价为1:0.74-1:0.87之间,两地的物价差额也约在20%之间。为了抚平中间的差额,两地联合召开了德州货币统一工作会议,决定在市场上缩减北币量的同时,增加冀钞的投放量,原则上将北币市场物价下压10%,冀钞市场物价则上提10%,从而实现双方物价的统一,控制物价波动。⁽¹⁰⁾

然而,临清事件的发生证明这一原则在实践中面临巨大的挑战。⁽¹¹⁾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华北、华东区的物资按新出台的货币比价进行流通。当时,华东区(北币市场)物价较高,特别是与冀钞市场的棉、布的价格相较,比差更大。如与临清相比,济南的棉花价格高出22%,潍县更高出81%。于是,华东及华北地区的商人及公营机构云集临清大量采购棉花,且公营贸易机构竟成主力,多达20余家。在10月9日-26日的18天中,抢购棉绒约150余万斤,导致华北区棉价暴涨57%,并引起其他物价上涨。⁽¹²⁾临清事件及其类似事件的发生说明地方所具有的离心倾向,这样的倾向在中央的检讨中被称为“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各自为政,无集中统一领导,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必然要产生的恶果”。⁽¹³⁾

若要消除这种恶果,就必须将地方财政与税收掌握在中央的手中,再由中央来统一分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显然难以促成。因此,中央认为,唯有先形成一个统一的、由中央掌握的货币市场,才能消除市场上的地方离心力。这就促成了人民币的出现。

3. 人民币的出现

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开始发行人民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人民币发行后,三区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为:人民币对冀钞、北海币:1:100;人民币:边币:1:1000;人民币:西北农币:1:2000。⁽¹⁴⁾人民币的出现使各区间的物资流通有了统一的参照系,但却并不意味着各区间流通就此完全畅通。

资料显示,由于各区发展不平衡,即使在华北区内,货币间的流通也需要通过中介机关的兑换来实现。⁽¹⁵⁾更显著的问题仍然是各区间物价不平衡所带来的

冲突。人民币发行后,华北区一般物价上涨 50%,原本物价就较低的晋绥区与之差距更形悬殊。因此,晋绥区的商人与群众产生了恐慌心理,争购物资。^[16]这种矛盾现象,随着解放区与人民币市场的不断拓展逐步改善。

解放区一直以粮食、布棉,以及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的重要物资作为货币保证。这一制度在蒋占区内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保证了解放区货币体系的稳固。^[17]因此,新解放区内货币更替过程实际上也是物资储备过程,这也是一直以来解放区内实行的以物资作为货币储备政策的发展。这一传统在人民币出现之后依然延续了下来。人民币发行之初,中央财经部秘书长薛暮桥就曾发文声称,人民币是用粮食布棉等重要物资作为保证,以物价做标准。政府将谨慎掌握人民币的发行数量,以保证持有人民币的人民,能够随时随地以其货币换回生活所需的各种重要物资。^[18]实际上,人民币发行后,地方货币虽然停止发行,但各地的公粮、税收等都由地方掌握,中央当时唯一可以支配的就是人民币。随着军费开支的扩大,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便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的选择。^[19]据 1949 年底薄一波在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总结,1949 年中央政府支出中的 18.7% 为赤字,靠发行货币解决了 61.6%,其余 38.4% 则由发行公债来解决。^[20]

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使人民币市场迅速扩大,新解放区规定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21]但从 1949 年 4、5 月份开始,物价上涨幅度的不断增大。这成为新货币发行后面临的重要困境。中财委对此进行了检讨,认为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货币增发造成的人民币币值的下降;新解放区的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多以银元或物物交换为交易手段,人民币流通范围不能随解放地区同比例扩大;在解放新区无法掌握足够的粮食,导致粮价数度激升,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导因。^[22]

从上述反思中可以看出,人民币推行过程中面临两方面困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不平衡;普通百姓对人民币的接受度与信任度不足。这导致物价不断上涨与人民币币值不断下跌。1949—1950 年全国物价出现了四次大的涨跌,经历长期通胀后的普通民众,面对这种反复,习惯性地选择使用储值货币——银元(铜元、铜分)。这成为中共在统一币制过程中面临的障碍。

二、货币统一过程中的阻力与反阻力^[23]

1. 打击银元

人民币在推行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对手是蒋币,如金圆券、银圆券。中共考虑到经济稳定与民众情绪,在新解放区内对蒋币多采取有步骤的排挤、收兑、禁用的政策,最重要的举措,是用蒋币来收购“敌占区”物资以充实解放区。由于金圆券从其发行之初便无法摆脱通货膨胀的弊端,因此其信用并不卓著,到 1949 年 6、7 月份已大体被清出流通市场,银元才是人民币最强劲的对手。^[24]

当时银元的流通范围甚广,几乎全国各地的民众都以银元为兑换标准,尤以新解放区⁽²⁵⁾为甚。银元因其本身便具有相当价值,成为稳定的储值货币,这种功能在战时体现尤其充分。1948年8月之后,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价值急速贬值。1949年6月行政院规定金圆券五亿元兑换银元一元,这意味着政府承认了银元的地位。⁽²⁶⁾

相对金圆券,中共各解放区内的币值虽然较稳定,但仍难与银元相对抗。如在晋绥边区,1942年1月,边区政府宣布农币为边区的唯一合法本位币,禁止银元贩运与流通;且在1942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扰乱金融惩治暂行条例》;但是,由于边区政府缺乏独立的财政金融体系,市场上的主要货币仍为银元,政府也只能以银元作为财政经费的货币单位。⁽²⁷⁾因此,农币的信用体系始终未能牢固建立,最终失去独立性,被迫依附于银元的价格标准。银元的禁而不止源于边区货币体系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是因财政开支增加需要所导致的货币滥发与贬值。这种情况在各边区并不少见。

各边区政府为了强推本区货币,纷纷出台措施禁止银元的流通。强行的禁止虽使公开的售卖消失,但银元在私下却成为市场上的宠儿,担当市场媒介的同时,其本身竟成为走私对象。冀鲁豫边区银元走私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在于银元的信用与走私的利润。据冀鲁豫四八分区的报告来计算,当时有组织的走私集团走私银元最高利润可达到250%。即便是那些个体走私者,最高利润也可达到170.8%左右。⁽²⁸⁾高额利润使银元走私者趋之若鹜,银元禁而不止。于是,边区政府唯有改变策略,通过政策刺激银元外流,最终达到在边区清除银元的目的。

据西北局金融工作报告,1948年西北局基本上采取了低价兑收刺激银元输出的政策。通过这样的政策,全年共输出148万元,主要换回粮食。与此同时,在控制区域内严禁银元周转与携带,违者一律没收,并予以处罚。⁽²⁹⁾之后银元的继续大量流通说明这些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成效。

人民币发行后,银元仍屡禁不止,成为人民币的劲敌。以上海为例。

解放之前,银元便为上海地区的通行货币。解放后的上海,银元在民间被普遍持有,与物价、民众生活紧密相连。⁽³⁰⁾银元是实际的本位币,人民币沦为银元的辅币,且总额不超过20亿,按照当时中国银行收兑银元的牌价1:1200(袁大头)来计算,仅相当于约167万银元,只能用来购买小批的物资。⁽³¹⁾更为特殊的是,由于上海是新解放区,解放时序是先城市后农村,其时城乡均为银元市场,因此要消除银元困难重重。⁽³²⁾

1949年6月8日,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邀请金融、工、商、企业界人士在中国银行举行了银元物价座谈会,会上决定以折实储蓄、实物工资、以合作社供给工人、学生、公教人员日用品等方法来禁止银元。⁽³³⁾

在实践中,华东财委决定用行政与市场双重手段对上海银元市场进行打击。首先,在京、沪、杭、芜各大中小城市禁止银元流通。同时,集中3500万银元,乘高价在黑市抛出,二三天内逐渐压低银元价格。其次,全面出动军警,镇压银元

贩子,对大投机者,给以严厉的处分。最后,银行以折实存款并收兑银元。贸易处抛售各种实物(油盐、粮煤和工业品)吸收人民币,但又适当收购工业品,放出人民币,一进一出,使物价维持稳步上升。⁽³⁴⁾

2. 银元不败

当时上海市委掌握的银元只有 500 万元左右。为达到预期效果,华东财委在调动其他地区的银元投放到沪市的同时,在周边城市禁止银元。3500 万银元投放后,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压低至 600:1 左右。这些措施一方面表明了上海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华东财委希望藉此探索出一条新的人民币推广道路。⁽³⁵⁾这一探索也表现在银行的折实存款中。所谓“折实存款”就是以米、布、油、煤球四种生活日用品为折实单位,将人民币(银元须兑换人民币)以折实单位存入银行作为本金,到期后可支取本金及应得利息,折合人民币后提取。⁽³⁶⁾这一存款方式鼓励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显然是为了应付物价通胀所带来的损失。这一作法,可有效地使民众将人民币而不是物资储存在手中。

三大举措并非同时进行,银元投放到市场后,迅速被银元贩子与周边地区的游资消融,而折实存款短期内效果也未能显现,特别是吸取私人存款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国家银行的存款中,比重最大的是公款。据统计,1949 年 12 月底上海折实存款数为 530 亿元,仅占全部存款的 24%。⁽³⁷⁾在这样的情形下,上海市委动用政治打击力对银元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严厉清理,逮捕了一批大投机者,方才使银元涨潮降温。⁽³⁸⁾之后,中国银行开始以牌价收兑银元,牌价接近黑市(1:1200),人民币在上海逐渐开始推广。⁽³⁹⁾1950 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开始逐月上升。⁽⁴⁰⁾到 1950 年 5 月份开始,6 个月的长期存款开始出现。⁽⁴¹⁾其他各大城市也多采取了相应的方式来驱逐银元,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人民币依然未形成强有力的信用体系,特别是在许多新解放区的乡镇,银元依然是最坚挺的货币,以货易货也是较为流行的贸易方式。

分析这一时期银元继续在乡村广泛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中的银元通过行政措施禁绝后,在流通领域虽然收敛,但因国家金银的牌价远低于黑市价,所以收兑数量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多。国家牌价低于黑市价的主要因素是当时国家手中并无充足的货币储备收购银元,因此只能采取“低价冻结”的方式来处理。⁽⁴²⁾

据统计,1949 年全国黄金仅上海一地约有 1000 万两,天津约有 200 万两,银币及银块全国共约 76000 万两。仅以银元来计算,1910 年颁布的《币制则例》中规定银元每枚重七钱二分,即 0.72 两。1933 年国民政府颁布的《银本位币制造条例》规定每枚银元重量为 26.6971 克,约 0.71 两。⁽⁴³⁾两者相衡取重者,计约一枚银元重约 0.72 两,按全国的总量来算,共约可计 11 亿枚银元,再取当时人民银行牌价中的最低兑换值约 600 元来算的话,共需人民币 6600 亿元。⁽⁴⁴⁾1949 年,人民币发行量为 16000 亿元,用其中的 41% 来收兑银元,在当时财政紧张的情形下,显然是不可能的。若要继续收购,势必要增发货币,这在经历了 1949 年

三次物价大涨的中国,显然也是不可取。⁽⁴⁵⁾因此,银元并未从民众的手中转移到国家的掌握中,仍然储存在民间待机发市,或者随着城市的严禁而逐渐流向农村,特别是流向那些新解放区农村。以华中区为例,截止到1949年底,除两广外,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中大约有4800万人口地区是银元流通区或以货易货区,占全区的50%以上。⁽⁴⁶⁾

虽然人民币的发行数量随着新区的不断增大而增加,但乡村银元市场在1949年底时依然广泛存在,直到1950年10月,仍有报道指出人民币在大部分新区的农村未普遍流通。⁽⁴⁷⁾因此,从1950年年中开始,如何推动人民币下乡便成为中央贸易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工作任务。

总之,在人民币信用体系未能完全确立时,民间的银元流通虽经行政措施的打击消沉下来,但在适当时机便成为人民币的强敌,不独农村如此,城市亦是。这一点在抗美援朝时期表现得尤其明显。⁽⁴⁸⁾这也充分体现了新货币体系建立的困境。对当政者来说,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障碍便成为当务之急。

三、中央建立人民币信用体系的努力

统一货币作为财经统一的重要一环,中央首先面临的便是如何处理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将税收、公粮从地方的手中顺利地纳入国库,以作为国家财政及推广人民币的物资储备;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消除银元在民间根深蒂固的货币地位,用人民币取而代之。为解决这两大困境,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点:其一,尽力稳定物价,并储备重要物资作为人民币的信用基础;其二,现金管理与国家行政费用的人民币化;其三,人民币下乡。

1. 稳定物价与建立人民币信用

1949年底新中国在经历四次物价飞涨之后,为制止物价再次膨胀,陈云指示以涨价最凶的沪津两地的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将物价控制在一定涨幅内。为保障物资的充分供应与货币的回收,陈云曾指示各地将物资调运至需要地区打压物价与回收货币。⁽⁴⁹⁾

为了弥补由货币增发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中央开始发行折实公债,以促进货币回笼。折实公债以“分”为单位,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拟发行二万万分,但实际上仅在1950年1-3月发行了一万万分后便停止。⁽⁵⁰⁾停发原因可能是公债的征收引起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弹与抗拒,导致各地工商业不同程度的萎缩,甚至废业与停业。⁽⁵¹⁾中央权衡之下,第二期公债停发,对于尾欠者,能交就收,无能力交者便停。⁽⁵²⁾

在发行公债和多收税之间,陈云认为多收税的好处显然大于发行公债。⁽⁵³⁾从实际来看,显然中央也一直执行此政策。当时全国农业税平均税率为19% - 21%。⁽⁵⁴⁾与清代的最高税率8% - 10%、民国时期5%的农业税率相比显然属于重税。⁽⁵⁵⁾工商税亦如是。按照1950年政务院所公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的规定,工商业税包括座商、行商、摊贩之营业税及所得税。⁽⁵⁶⁾当时营业税为

1% - 3% ,所得税为 5% - 30%。⁽⁵⁷⁾ 1931 年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工商业税最高为纯收益的 10% ,实际执行过程中各省市还较此标准为低。⁽⁵⁸⁾

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们显然也意识到税率过高的问题 ,特别是对农民 ,但认为从全局和长远来看 ,目前只能如此。1950 - 1952 年间 ,税收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5.1%、60.9%、53.2% ,充分表明了税收在整个财经体系中的重要性。⁽⁵⁹⁾ 通过对农业税的征收 ,中央掌控了全国公粮。

另一种中央着力掌握 ,用于调控物价的物资便是棉纱。在物价膨胀之时 ,这也是市场资本容易进攻的对象。⁽⁶⁰⁾ 1949 年 11 月物价大涨之时 ,中央便着力调整全国棉纱的分布 ,将华中的棉纱运往华东的上海、汉口等各大城市 ,陇海沿线的纱布运往西安 ,以稳住物价。⁽⁶¹⁾ 这一经验对后来中央的物资管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至 1951 年 1 月 4 日 ,政务院公布棉纱、棉布统购办法 ,规定棉纱、棉布由国营公司承购。⁽⁶²⁾

在稳定物价的同时 ,中央对引发 1949 年的四次物价飞涨原因 ,也有清楚的认识。原因之一 ,全国军政公教人员不断增多导致财政支出增加。1950 年 3 月 ,全国军政公教人员已经超过 900 万人 ,其中军队约 500 万 ,其费用需要中央支付 ,而税收却没有按计划完成 ,致使中央收支脱节。原因之二 ,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中 ,税收中的一大半也是由地方掌握 ,中央拿不到 ,唯有靠增发钞票度日。粮食、税收是回笼人民币的主要物资 ,拿不到粮食与税收 ,中央对物价膨胀就无法调控。⁽⁶³⁾

于是 ,1950 年 3 月 3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 ,并将此令下发到各级政府照章执行。《决定》针对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币、物储备不均衡的状况 ,规定除地方附加粮外的全国各地所收公粮(包括折征代金) ,及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收外 ,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 ,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⁶⁴⁾

为管理各地上缴的公粮与税款 ,中央设立了垂直管理的中央金库与中央公粮库 ,随时调度并防止地方挪用。⁽⁶⁵⁾ 截止到 1950 年 7 月 ,共建立 1657 个金库 ,华北、西北、西南大部地区均已建金库。地方所设粮库的情况不明。⁽⁶⁶⁾

从理论上讲 ,新中国的财经统一至此已经完成。

2. 现金管理与国家行政费用的人民币化

现金管理始于《决定》的颁布。据《决定》 ,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人民银行规定 :一切军政机关、公营企业、合作社的现金除酌留少数备用金外 ,全部存入银行 ,并规定各被指定的单位要编制收支计划。除必须使用现金部分外 ,各种经济往来尽可能地完全经过人民银行划拨转账而不使用现金。⁽⁶⁷⁾

现金管理的工作逐步推广到全国 ,紧缩了银根 ,也逐渐降低了货币的流通速度。银行的存款大幅度增加。据统计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四月底较二月底存款增加 1.1 万亿 ,其中 79% 为实施现金管理所增。⁽⁶⁸⁾ 人民银行在 1950 年底总结中

指出,全国国营企业与机关的88%已在银行开户,其中60%已规定了库存限额,54%已实行了转账。⁽⁶⁹⁾重要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北京、汉口、广州等地,国营企业与机关开户已达100%,已规定库存的户数,平均已占到62.3%。⁽⁷⁰⁾

与现金管理同时实施的还有“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即全国各地的机关、国营企业、部队、团体、合作社等,在人民银行的帮助下健全会计制度,编造每年货币收支计划,将各单位的财务情况置于人民银行的监督之下。据统计,到1951年初,全国应受货币管理的单位已有90%以上编造了收支计划。⁽⁷¹⁾这样的方式实现了国家回笼与管理监督货币的目标。

现金管理虽然达到了紧缩的初步目标,但对于当时的私营工商企业来说,这一政策却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银根紧缩,贷款难以取得,再加上抑制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造成了全国性的市场萧条。据统计,上海市4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分别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另据统计,14个较大城市在1950年1月到4月倒闭的工厂合计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9347家。全国失业工人逾百万。⁽⁷²⁾

经济萧条对国家财政收入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50年四个季度的财政赤字分别为43%、40%、9.8%、6.4%。⁽⁷³⁾赤字比例的变化从侧面说明了1950年第一季度财政紧缩情形下税收的下降及其影响。

3. 人民币在农村的推广

一味紧缩银根,光堵不疏,所导致的这一系列问题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有鉴于此,从1950年4月10日开始,中央向城乡市场上投放货币,5月初市场开始出现转机。工商业者经营情况开始好转。据上海、天津、北京、武汉、青岛等城市的统计,10月份同4月份相比,大米、面粉、棉布和棉纱的销售量分别增加了298%、54%、233%和18吨。⁽⁷⁴⁾此时,如何扩大货币的市场流通量便被提上日程。1950年下半年人民币下乡成为中央贸易部的工作重心之一。

人民币下乡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分为“放”和“收”两个部分,即购买农产品和出售工业品,以此来扩大人民币在乡镇中的市场占有率。华东军政委员会规定具体办法为:组织城乡公营贸易机构与合作社,运送农民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物资,如肥料、农具、布匹等到乡村中去出售,货款指定只收人民币。另一方面,各专业公司必须经常并大量地收购农副产品如丝、茶、麻、烟叶、桐油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以便巩固人民币信用,稳定农村物价。同时,农业品的收购也可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为货币下乡创造条件。⁽⁷⁵⁾

人民币下乡的实际过程,也是在乡镇建立工业品售卖与农业品收购营业网点的过程。首先规定要选择重要集镇建立公营零售商店,如其地已有较健全的合作社组织,可委托它们为零售代理店,否则,由各级人民政府协助合作领导机关,建立供销、运销、生产、信用等合作社。公营贸易机构与合作社相互配合的同时,并注意组织各集镇、乡村中的小商小贩,按照批发价格,售以整批货物,使之深入农村,展开推广人民币的工作。⁽⁷⁶⁾这种对私商的运用,主要是源于乡镇市场

上国营贸易体系的不完善及资金的不充裕。中央贸易部在其人民币下乡的工作方针中,便强调了要尽量利用私商下乡以开拓货币阵地,同时国营贸易机关作为私商力量的补充,在重要乡镇中建立部分贸易据点,可见此一时期私商对推动人民币下乡工作的重要性。⁽⁷⁷⁾

在此时段内,为保证私商的利润,贸易部制定了粮食的购销差价及季节差价,如江西便据此规定为利润在 7% - 10% 之间。⁽⁷⁸⁾当然,这仅是国营粮食机构没有设立或者网点很少情况下的一种临时过渡方式。⁽⁷⁹⁾中央希望私商的作用仅止于此,国营商店应该在市场上负起调整物价与监控市场的作用,掌握粮食、煤炭、油品、布匹和生产工具等重要物资的大部分货源。⁽⁸⁰⁾

在这个体系里,中央希望私商仅是国营机关与农民之间的媒介,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国营机关与私商各自对利润的追求注定了结构的断裂。国营商店对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的掌控,使私商的利润空间被决定。国营机关在手续上的繁杂与坐等经营的风格却又使私商在此时期有一定的活动空间。⁽⁸¹⁾据统计,1950 年国家在粮食市场上收购比重实际只占 23%,私营粮商收购比重则高达 48%。⁽⁸²⁾

政府对于私商的优待政策随着国营贸易机构网点的铺开而被剥夺。当时中央虽然掌握着牌价的决定权,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给予地方部门 2% - 5% 的机动权,某些地方便出现了滥用机动权的情形。这就导致这些地方的私营市场被逐渐压缩。⁽⁸³⁾1951 年 12 月,中央发出对于私商联营的意见,对那些非国营贸易领导下的私商联营,虽表面上承认其合法,但要求应设法监管,甚至对其斗争、拆散。⁽⁸⁴⁾这其实可视为在国营市场逐步完善后,压缩私商市场的信号。1952 年 1 月,陈云等人提出粮食经营中国营的比重应该增加,淘汰部分中间商,若私商联营垄断市场,则以经济斗争与行政管理两种手段加以对付。中央批准了此报告。⁽⁸⁵⁾姑不论私商此时是否有垄断市场的能力,此决议实际给了政府与国营贸易机关以非市场手段打击私商的权力。

决议的发出与“五反”运动的开展使各地私商的市场受到打击,国营贸易机关与合作社趁机对市场进行了垄断。如某些地区甚至规定所有小麦必须卖给合作社,不准卖给私商。国营商店与合作社的业务发展迅速,不但在批发市场,在零售市场上也开始占主要地位。⁽⁸⁶⁾据统计,1952 年国营贸易机构收购粮食的总数为 73%,私商为 27%,与 1950 年相比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⁸⁷⁾国营贸易机关在粮食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对推广人民币下乡十分有利,可有效地避免银元的继续流通。

人民币下乡的另一个设想就是在农民将农副产品换取人民币后,国营贸易机关再通过售卖工业品在乡镇中回笼货币,从而实现货币在工农业产品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使人民币占领城乡市场。这一设想与工业立国的远景目标相结合,影响了中央对工农产品价格的制订。农业作为工业基础的指导思想最终导致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

当时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开始 ,大部分工业品的生产还掌握在私营企业主的手中 ,但是通过控制原料和产品推销两方面 ,国家正逐步将工业品控制在国营贸易机构与合作社的手中。^[88]之后 ,国营机构将其中部分批发给私商经营 ,另一部分则通过零售方式推销给农民。剪刀差随着农产品季节差价与地区差价而变化 ,当粮食收购紧张时 ,便提高粮价 ,反之 ,便提高工业品价格。从总体来看 ,1950 年到 1952 年剪刀差是逐步缩小的趋势。具体见表 1。

表 1 1950 - 1952 年工农产品价格指数(以战前七年平均价格为 100)

年份	江西粮食类收购 价格总指数 (1)	江西工业品销 售价格总指数 (2)	江西工农产品价格 比价指数差变化 (2)-(1)	全国工农业商品价 格比价指数变化
1950	176.02	252.70	76.68	100
1951	199.38	274.48	75.10	92.2
1952	206.95	270.48	63.53	90.3

资料来源:李林茂《建国以来江西物价回顾》(连载) ,《江西物价》1984 年第 9 期 - 11 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 ,第 635 页。

按表 1 所示 ,无论在全国 ,还是江西 ,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逐步降低 ,但是销售量仍不理想 ,国营百货公司虽竭力推销 ,但每月最多仅能完成计划的 80%。^[89]一方面或许是农民惜售粮食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农民手中并无余钱来购买多余的工业品。因此 ,通过人民币下乡的手段虽然部分解决了在农村中推广人民币的问题 ,但导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工业品与农业品之间的价格失衡使粮食收购成为困扰中央决策者的大问题。

表 2 1950 - 1952 年全国粮食生产与收购情况(折合细粮 ,单位:亿斤)

年份	粮食实产量	国家收入粮食	支出粮食	收支差额
1950	2195.4			
1951	2493.2	498.3	401.5	96.8
1952	2924.2	547	587	-40.0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第 4 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4 年 ,第 119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第 255 - 267 页。

正如表 2 所示 ,1952 年全国粮食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高达 40 亿。中央在对 1953 年粮食市场的预测中认为 ,因小麦受灾 ,预计 1953 年将减产 70 亿斤 ,这必然使国家的粮食问题更加紧张 ,甚至难以为继。^[90]为解决这个问题 ,1953 年 9 月 25 日 ,中央发出《关于收购粮食问题的宣传指示》 ,号召农民力行节约 ,破除惜售思想 ,将粮食卖给国家。^[91]最终 ,为缓解这种粮食紧张状况 ,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计划供应 ,即统购统销。10 月 10 日 ,陈云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指出目前粮食市场的几种问题 ,其中收少售多可谓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 ,这一问题不解决 ,必然导致物价的再次膨胀 ,以及经济局面的混乱。^[92]在随

后 11 日的粮食会议上,谭震林、李井泉、刘澜涛、马明方、张秀山分别代表华东、西南、华北、西北、东北区表示了对新政策的支持,其中在谈到粮食问题的紧张时,认为农民的“自发势力”与存粮现象通过新政策将可得到解决。⁽⁹³⁾以此为思路,统购统销政策出台,政府在农村中展开对“余粮”的大规模征收。

四、结 论

回到本文开头提问,在财经统一的大背景下,货币统一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人民币的出现既是统一国家内部财经体系整顿的需要,也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物资分配的需要。

人民币统一的实现,得益于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统一初期,中央与地方曾因经济利益的不同而出现冲突,中央吸取教训,在建国后实行的政策措施中,多是从宏观的政治局面着眼来协调与地方的关系,地方的经济利益在政治原则下必须服从于中央全局;第二,在地方的服从之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行政措施来实现财经权收归中央的目标。地方仅成为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在双方的协作下,货币统一最终实现。因此,统一过程实际也是地方“妥协”于中央的过程。妥协的达成是以强力的政治原则为基础,以行政管理手段为措施。

人民币的统一,深刻地影响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曾希望用市场手段来解决货币统一中的银元之战。然而,银元的广泛流通从根本上来说并不仅仅是投机资本操纵的结果,更多的是普通民众在面对不确定的货币体系时一种本能的经济自我防护。因此,单靠国家的市场手段很难即时生效。于是,中央改变思路,运用私商的财力与人力,以达成人民币下乡的目的。当国营贸易网络逐步完善,私商成为市场竞争对象时,政府逐渐接管市场,最终形成了以国营机构为主的生产与推销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民众逐渐从市场的主导者变为边缘人。

货币统一的实施也对 1950 年代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建国初期,中央便提出要以工业立国,当时中国工业基础的薄弱,惟有以农产品作为积累的保障,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货币下乡此时便成为实现这一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最终,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集中地表现在了粮食问题上。为解决这一矛盾,陈云曾提出八种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即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维持自由买卖政策、“临渴掘井”(先自由买卖,若不行,再征配)、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⁹⁴⁾此八种方案中,中央最终采纳了完全排除市场经济的第一种方案,即又征又配。

这一政策将粮食的产、销、用置于国家的全面监管之下,最终剥夺了农民的交易机会,将银元从农村市场驱逐出去,达成了货币的统一。这既是可以即时生效的方案,也符合从货币统一政策实行以来运用政治原则解决市场问题的逻辑。因此,我们可以说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并不仅仅是 1953 年粮食危机的结果,⁽⁹⁵⁾更多的是政治逻辑战胜市场经济的结果。

建国前后在财经领域所进行的货币统一,采用了经济与政治两种手段来进行,甚至初期市场经济的手段还甚被倚重。然而,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意味着经济手段的被抛弃。从本文来看,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市场手段的屡屡受挫与政治手段的大显其效;另一方面是因为两种手段运用的成本相差悬殊,使决策者最终倾向了对经济的管制。这种以政治原则取代市场经济的手法也成为1950年代新中国经济领域里一以贯之的思维逻辑。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594-599页。

(2)魏宏运《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27-42页。

(3)石雷《新中国本位货币——人民币的诞生及新中国货币的统一——回忆筹建中国人民银行片断》,《金融与经济》1986年第9-11期。

(4)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12页。

(5)[7][8][9]《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第276、353-364、389、395-397页。

(6)《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第278-294页;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10)《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二辑),第304-306页。

(11)这种市场上的困境在货币统一之前便已经开始出现。参见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冀鲁豫边区金融史料选编》(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316-323页。

(12)[13][14][17][18]《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四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5-97、97-100、52-53、55-56、93-94页。

(15)《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705-706页。

(16)[27][29]《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金融贸易编),第776、288-314、284-287页。

(19)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141页。

(20)[45][49][50][52][54][57][6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58-62、35-38、35-38、63-64、261-268、71-85、261-268、160-166页。[21][22][24][31][33][34][35][36][37][39][40][42][4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174-175、165、177-179、192、189-194、186、187-188、187-188、210-213、208-209、189-194、243、205-206、194-197页。

(23)关于银元在乡镇基层的消除过程,笔者将以个案形式另文论述。

(25)这里新解放区是相对于1949年前的老解放区而言,主要位于长江以南。老解放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东北、华东等区。这些老区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货币体系,因此较容易与人民币进行兑换。

(26)洪葭管主编《中央银行史料(1928.11-1949.5)》,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第1385页。

(28)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山东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冀鲁豫边区金融史料选编》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第280-282页。

(30)江大风《共产党怎样管理银元》,大公出版社,1949年,第8-9页。

(32)《陈云文集》(第一卷),第678-680页。

(38)[72][74][9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2-85、94-95、103-109、255-267页。

(41)[53][60][66][68][71][73][8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715、

225、225 - 228、228 - 229、715 - 716、720、873、423 页。

〔43〕李伟民主编《金融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191 页。

〔44〕关于银元与白银之间的价值与兑换比例，从 1953 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为调整全国白银、银元收兑办法及牌价由》来看，1 市两银元与 1 市两白银之间的价格约略相等，在此为计算上方便姑且等之。见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编《货币发行和金银管理业务文件汇编（1948 年 - 1988 年）》，第 912 - 913 页。

〔4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7 页。

〔48〕《陈云文集》（第二卷），第 186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244 - 245 页。

〔5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356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96 - 98 页《内部参考》第 161 号，第 63 页。

〔55〕〔美〕王业键《清代田赋刍论（1750 - 1911）》，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65 页。

〔56〕《中央财政政策法规汇编第一辑（上册）》第 181 - 184 页。

〔58〕李如汉《中国田赋高度的新估计》，1933 年，《地政月刊》第 1 卷第 3 期，第 14 - 18 页。

〔59〕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中国财政统计（1950 - 1988）》，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9 年，第 18 页。

〔61〕〔67〕〔69〕〔70〕《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金融卷），第 208 - 209、218 - 219、227 - 230、231 页。

〔62〕陈云《实行棉纱棉布的统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507 - 508 页。

〔6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72 - 85 页；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 28 页。

〔64〕财政部综合计划司《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1950 - 1980）》（第二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年版，第 31 - 36 页。

〔75〕〔76〕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推行人民币下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的指示》，1950 年 5 月 16 日，SHA，B1 - 2 - 345。

〔7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29 - 31 页《陈云文集》（第二卷），第 149 - 151 页。

〔78〕〔79〕〔81〕〔82〕〔84〕〔86〕〔87〕〔91〕〔92〕〔93〕《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 136、136 - 137、59、80 - 81、138 - 139、139 - 141、80 - 81、147 - 150、150 - 161、161 - 169 页。

〔8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03 - 109 页《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 110 页。

〔8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3 册），第 41 - 47 页。

〔8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第 243 - 245 页。

〔89〕《1949 - 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第 627 - 629 页。

〔94〕《陈云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203 - 217 页。

〔95〕田锡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第 98 - 102 页。

（责任编辑：公 乙）

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

Key words: Ming Dynasty's popular fiction; the description of currency; the Ming Society; narrative literature; the historical of Chinese novels creation

Shao Min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Merchants Depreciation of the Renminbi and Image – building of the Government (1949 – 1950)

Abstract: By breaking down ,reconstructing and analyzing publically available data ,this paper proves that Chen Yun's view is right: the depreciation of Renminbi (RMB) between 1949 and 1950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over – supply of the currency. The inflationary currency policy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en Yun'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olicy ,but it also included anti – inflation ingredients i. e. self – correction on inflation. Such inflationary currency policy and the anti – inflation ingredients it included ,were described by Chen himself as results of severe class struggle ,and described by others as great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government.

Key words: Chen Yun; Depreciation of Renminbi; Shanghai Merchants

Cao Shuji & Zheng Binbi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urrency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1949 – 1953)

Abstract: It was urgent for new PRC to integrate currency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credit system after 1949. Therefo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ok thre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material reserves and eliminating of the silver yuan. First ,to stabilize the prices and stock important materials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MB. Second ,cash management and the RMB settlement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Third ,to promote the use of the RMB in the rural areas. The policy and the long – term target of founding an industrial country along affected the assigned prices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eventually caused the price scissors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ever ,this made the farmers unwilling to sell their grain. It finally decided to implement the state monopoly over purchase and sale of grain. Replac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market economy with the political became the common mode of thinking when new China dealt with its economic problems in the 1950s.

Key words: national credit system; currency integration; state monopoly over purchase and marketing

Wang Chuny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 Artist of Anhui Province That Should Not Be Forgotten

Abstract: By combing clues of manuscript circu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Having Read on the Writing Desk* (ju ji ceng ka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of a book on writing and calligraphy that has long been ignored. By studying the family background and writing experiences of Ge Kangyu the author ,it reveal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families of Chen Duxiu ,Deng Yizhe and Ge Kangyu ,and the process of how Ge Kangyu grew up under the instructions of Chen Duxiu and Deng Yizhe. Through analyzing the principle of *Having Read on the Writing Desk* ,it summarizes the author's deep understanding and peculiar opinion of calligraphical theori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ers and their works.

Key words: Ge Kangyu; *Having Read on the Writing Desk* (ju ji ceng kan)

Qian Nians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2 Anhui